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5.011

歌谣与政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听觉符号中毛泽东形象的构建

牛宏程^{1,2}

(1. 山西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2. 延安大学 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传播, 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在歌谣中具有三个维度的文化意义, 即毛泽东是革命理论的建构者, 是救国道路的开拓者, 还是为民服务的实践者。听觉符号中毛泽东形象的传播, 筑牢了党的执政基础, 实现了民族情感认同, 形塑了民族共同理想, 并在引领政治生态健康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形象; 新民主主义革命; 听觉符号; 政治符号

中图分类号: J6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5-0082-08

Ballads and Politics: Construction of Mao Zedong Image in Auditory Symbols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NIU Hongcheng^{1,2}

(1. Collage of Liberal Art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Mao Zedong image was disseminated as an auditory political symbol,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social impact. As an auditory political symbol, Mao Zedong image has thre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ballads, namely, Mao Zedong is the builder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the pioneer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ractitioner of serving the people. The spread of Mao Zedong image in auditory symbols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arty's governance, realized the national emotional identity, shaped the national common ideal,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logy.

Keywords: Mao Zedong imag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uditory symbols; political symbols

听觉活动是人类感知世界的基本途径, 也是人类表达主观情感的重要方式^[1]。其以音乐符号为中

心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 使审美经验也在不断地“具体化”。也就是说, 艺术

收稿日期: 2024-05-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证研究”(19ZDA18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二十世纪文学的民俗文化研究”(19JHQ036);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基地调查与对策研究”(2003YY036)

作者简介: 牛宏程, 男, 陕西榆林人, 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 延安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延安文艺。

作为感知对象的客体，它所表达的形象才是思想理念的集中呈现^[2]。从这个角度来看，听觉符号（这里特指民歌）与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象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区别，用各门艺术的手段都可以表达出等值的思想和情绪^[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听觉符号（民歌）对毛泽东形象的建构，承载着这一时期民众的情感价值与集体记忆，其对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实现民族情感认同、形塑民族共同理想、引领政治生态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学界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拟以歌谣与政治的互动为出发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听觉符号（民歌）对毛泽东形象构建问题进行探析，以期推动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入。

一、听觉的政治隐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歌谣与政治的美学互动

作为身体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听觉符号的运行机制隐含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听觉因其易被操纵的特性，这一感知始终处于意识形态的管控之下^[4]。在革命斗争的现实要求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参与了作为表征大众日常身体实践的民间歌谣的塑造和改写，逐渐建构了一套革命意识形态听觉表征系统，使其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大歌谣运动可视为近代中国听觉符号融于政治的开端。对于早期歌谣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而言，在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文学革新运动中，民间歌谣的价值在被重新拾起的同时，又似乎显得“多余”，因而时常受到官方文学的质疑，被扣上“非正统”的帽子，一直不登大雅之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加之左翼知识分子极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歌谣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

“民间歌谣”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打上了“红色”印记，成为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的“代言人”。1921年1月，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创作的《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最早发出了“无产阶级站起来，联合农民去进攻”的斗争口号。接下来，在各地发起的工人罢工活动中，产生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歌》《京汉罢工歌》《工人联盟歌》等一批代表性作品。特别是安源工人创作的口头长篇叙事歌曲《劳工记》，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反

对压迫、团结对外、振兴中华的精神气概。1924年，为配合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一大批表现革命斗争现实的歌曲创作出来了。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红色歌谣有《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其提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的口号，表现出服务革命、动员革命的价值趋向。

1927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土地革命的开展，赣南、闽西地区人民的价值观念、生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福建古田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这一要求的提出，使得群众性、政府性的歌谣创作与搜集活动，以气吞山河之势在中央苏区快速开展，大量红色歌谣创作和保存了下来。这些革命歌谣继承民间歌谣大众化的形式，全面、真实、鲜活地反映革命生活、革命精神，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使之凝聚成更为强大、更有黏性的共同体^[5]。其表明中国共产党以民歌为基础的新的、大众的、革命的、时代的文化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内容上讲，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歌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揭露国民党残酷统治、剥削压迫，表现普通群众生活的歌曲，如《农民苦》《五更鼓》《苏维埃农民耕田歌》等；二是宣传党的政策、歌颂革命领袖的歌曲，如《送郎当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共产党十大政纲》等；三是表现军民鱼水情的歌曲，如《十送红军》《苏区干部好作风》《八月桂花遍地开》等。这些红色歌谣往往利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来记载普通劳动人民的身体实践，表征他们真实的情感体验。事实证明，传统被置换为“革命”，并没有带来大众的反感。红色歌谣以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教育人民群众，通过对个人情感的重新书写，用普通大众的“身体经验”作为沟通“个人”与“革命”的桥梁，赋予个体新的意义，其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心，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延安时期，贫瘠荒凉的自然环境和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催生了延安的声音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视觉文化大相径庭，但延安产生的以交

响乐为最高形式的声音文化是战争时期与革命时期所必需的激情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催生新的情感方式和主体经验的文化实践,因而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6]。奠定民间歌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地位的标志事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7]860-861}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和群众响应基础上,在延安文人团体的介入下,中国迎来了听觉艺术融于政治的高潮。一时间,陕甘宁边区涌现出数以万计的红色歌谣,红色歌谣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延安城也一度被称作“歌咏城”。在歌曲创作方面,借助听觉符号来塑造毛泽东伟人形象的歌谣被大量创作出来,如孙万福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李有源的《东方红》、王庭有的《绣金匾》等。这些民歌的歌词朴素无华,有的甚至配上了地方方言,但都表达了对革命领袖的无比尊崇。歌谣对毛泽东形象的建构,成为表征革命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原因在于,音乐是通过声音来塑造形象和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其“能以一种艺术化的手段推动意识形态从普遍性‘常识’变成一种信仰体系,产生说服力和鼓动性,使得视听者获得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达到精神和情感层面的认同”^[8]。在对毛泽东形象符号化塑造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政治主张浸润其中,实现了歌曲的大众化、民族化和时代化,这些歌曲成为陕甘宁边区群众的精神支柱和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战斗号角。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歌曲中的毛泽东形象是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交汇融合的结果,是政治智慧与民间艺术的结合,其产生既具有历史语境,又具有现实语境。毛泽东形象作为政治符号,融入红色歌谣之中,体现了艺术与社会现实的结合。一方面,毛泽东政治符号形象的塑造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条件下,为自身生存的发展需要,将毛泽东形象意识形态化并加以传播的结果。其既构建了理想的政治生活,又强化了革命的认同。另一方面,文化是在不断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把毛泽东形象作为政治符号进行传播,

同样也是歌谣内在发展规律的要求。毛泽东形象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民间歌谣的发展由个性化转向大众化。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在借助民间歌谣这一通俗化的艺术形式基础上,对毛泽东形象进行了成功的传播,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二、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在歌谣中的三重维度

政治是人类生存无法回避的事实,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之中^[9]。由于毛泽东形象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以及毛泽东作为“今朝风流人物”的魅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在人民大众中广泛流传,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民间歌谣中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表现在革命理论的建构者、救国道路的开拓者、为民服务的实践者三个维度上。

(一) 革命理论的建构者:他是人民大救星

1840年以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在民族危亡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自此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谁来领导中国的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国情构建出符合中国实践的革命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革命理论的核心要义。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0]534}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纠正了党内长期“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倾向,真正构建了中

国特色的革命话语体系。为了更系统地阐明党的革命理论，更好地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此后几年间，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实践论》《矛盾论》等诸多重要理论著作，形成了其系统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革命理论的建构者形象是共产党对其形象的主动塑造与广大民众自发认同的双向过程。“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是当时群众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认同的生动写照。当时的延安城，物质条件匮乏，为什么能像一块磁石一样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作家何其芳的答案是延安“燃烧着热情”，摄影家吴印咸的答案是“延安乃理想所在”，文学家丁玲的答案是“这是乐园”，而陕北老百姓用动听的歌声唱出心中的答案：“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受苦人出苦海见了光明哎哎呀”，“瓜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老百姓连的共产党，共产党连的人民”，“宝塔山山高高，延河水水清清，信天游唱了一年又一年，咱百姓年年都唱朗格格的东方红……”值得一提的是，利用陕北民歌元素这种“旧瓶装新酒”形式改编而来的红色歌曲《东方红》，更是一时间唱遍大江南北。红色歌曲《东方红》中对共产党“人民救星”“民族救星”“太阳”形象的成功构建，佐证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探索出来的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认同与赞誉。

（二）救国道路的开拓者：大海航线靠舵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国社会各阶级相继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一时间“民主改革”“民主共和”等各种“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盛行。青年毛泽东为了探索救国道路，也把研究西方的“各种主义”作为学习和思考的主要目标。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奋斗目标，毛泽东自觉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开启自己的救国之路，逐渐树立起救国道路开拓者的政治形象。

不同于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对西方各种“主义”的生搬硬套，毛泽东强调要重视实际情况与社会实践。这是毛

泽东救国道路的根本要义。1926年，毛泽东亲赴湖南进行实地考察，并于1927年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充分地肯定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并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民革命运动的目标是冲击束缚在农民身上的“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系统。为了进一步动员民众参加斗争，毛泽东强调，“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11][21]}。然而，这一正确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采用。革命失败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国革命的道路该走向何方？这一时代之问，变得更加紧急而迫切。

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以卓越的胆识和杰出的实践探索，领导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随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长期坚持这一革命道路，积极发展根据地，开展各种革命运动。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事实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

抽象的革命道路这种政治话语对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老百姓来说是较难理解的，因此民间歌谣把其内化为对毛泽东的认同。“毛泽东指出了光明路”“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抗日有面大旗，旗手就是毛泽东，大伙百姓跟着走，抗日一定会胜利”“跟着毛主席前进”“共产党来了跟上走”“穷人离了共产党，黑暗行船无方向”是当时最能体现民众对毛泽东所开辟道路认同的歌曲。此外，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群力报》还刊登了《拥护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纪念专文，盛赞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一座灯塔，是中国从古至今的最伟大的领袖”，提出要“坚决地永远地跟着毛泽东同志走向胜利”^[12]。“光明路”“旗手”“灯塔”恰恰说明了毛泽东的方向代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其本质是对党的民主革命道路的认同。正是因为毛泽东所开辟的革命道路

的正确,所以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跟着毛泽东走。对此,斯诺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但是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有力的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在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13]

(三) 为民服务的实践者:挖断了穷根翻了身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从遵义会议之后,到中共七大的召开,毛泽东在广大民众心中实际上成了一个鲜活的政治符号,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毛泽东为民服务的实践者形象,集中体现在他关于政党与人民关系的经典论述当中。在谈到文学艺术与人民的关系的时候,毛泽东曾言:“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7]863}他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7]857},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7]1004}。就民众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言,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4]。毛泽东认为,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就是要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要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他指出,共产党人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就要关心群众生产生活,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1]136-137}。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5]抗日战争时期,在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经济困难、百姓负担重的问题在各个根据地开始凸显。为了解决困难,毛泽东向大家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于是,陕甘宁边区开启了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毛泽东也积极投入到生产运动当中。他找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党号召大家生产自救,我也要响应号召,请你们

为我划一块地,我也要开荒。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警卫员在他的窑洞前选了一块荒地。毛泽东常在办公之余,扛着锄头出来耕种^[16]。在他的带动下,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始及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地,边区群众的劳动热情高涨了,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边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民众的精神面貌极大地改善了。这一情况在当时根据地民间歌谣对毛泽东的颂扬中得到证实。如传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歌谣《南泥湾》中唱道:“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再如,孙万福在《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中唱道:“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谷万物生,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断了穷根翻了身。为咱能过上好光景,发动了生产大运动,人人努力来生产,丰衣足食吃饱饭。边区人民要一心,枯树开花耀眼红,千年枯树盘了根,开花结籽靠山稳。”这些朴实的歌词,塑造了毛泽东为民服务的实践者形象。这些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文艺作品都是人民群众自发创作的,充分说明人民选择了毛泽东,人民拥戴毛泽东^[17]。

三、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符号融于政治的社会效应

政治符号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和传播载体,政治符号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政治文化进行的传播^[1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间歌谣这一听觉符号,以美学的方式对毛泽东形象进行建构与传播,使得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形象深入人心,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 搭建沟通桥梁,筑牢党的执政基础

作为审美主体精神外化的符号,承载着情感传递的功能。在政治世界里,符号是群众向往之标志,具有实现政治认同的巨大潜力。一般来说,政治认同是个体对于政治权力的心理归属和情感倾向。认同的形成起源于个体的心理和情感,最终也通过个体的心理、情感及行为等层面来体现。这样,政治认同始终存在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张力^[19]。革命领袖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是实现革命理论、政治道路认同的重要介质,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在沟通

群众、传递情感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符号，毛泽东形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性符号^[20]，是实现民众政治认同的手段。毛泽东形象符号化增强了群众的情感认同，促进了民众对党的革命道路的自信，从而筑牢了党的执政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绝对不是通过纯粹文本研究、理论逻辑推演能提出来的，而是在革命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甚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提出来的^[21]。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广大民众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遍现状，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0]534}于是，自觉选用与工农兵审美文化相适应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便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文艺扎根向下的重要表现形式。民间歌谣因为其通俗化的语言与极强的情感感染力，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官民互动”的新载体。由于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参与，当时的民歌中涌现出一大批歌唱毛泽东的唱词，如“他是人民大救星”“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红旗是咱领袖毛泽东”“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等等。显然，毛泽东作为革命理论的建构者、救国道路的开拓者、为民服务的实践者，在广大劳动群众心中已经成为形象符号，成为广大民众理解与认同党的革命理论、革命道路的媒介。广大民众通过对毛泽东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符号的认同，加深了对党的情感认同，这些歌曲在召唤群众、革命动员等方面发挥了凝心聚力的作用。

（二）激励动员群众，实现民族情感认同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主要包含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民族凝聚力、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22]。如何有效地动员群众，实现民众对民族情感的认同，是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一直思索的重要问题。列宁指出：“靠理论说服不了落后群众，他们需要的是亲身体验。”^[23]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考察与革命斗争的现实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到民间去”的文艺大众化道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陕甘宁

边区掀起了知识分子“下乡”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火热场景。民歌作为地方老百姓的身体经验，自然而然进入了延安知识分子的眼中。在意识形态的介入后，政治力量借助民歌本身的曲调随意添加政治内容，从而实现了民众对民族情感的认同。由于不是借助强制专横的手段来实现情感认同的目的，而是通过取材民间而又还于民间的审美修辞策略来实现政治的社会功能，所以这些歌曲很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民众也自觉地接受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民间歌谣中所释放的动员群众、参军抗日、反对压迫、解放人民的政治信号，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情感信念、精神支柱，并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潮流之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陕北民歌《骑白马》到《移民歌》再到《东方红》的情感转变。从情感结构来看，《骑白马》所蕴含的情感虽添加了抗日的因素，但四妹妹对三哥哥的个人情感仍占据主要地位；至《移民歌》时，歌曲的情感开启了个人情感向民族性情感的转变；至《东方红》时，个人情感完全实现了到民族情感的蜕变。在《东方红》的演变过程中，民族情感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歌曲主人公实现了由作为社会“底层”的三哥哥到伟人毛泽东的转变。从“三哥哥”到“毛泽东”的置换，恰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的正确性。由于民众对毛泽东形象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而非政治强求的，这就使得民间歌谣的叙事中对毛泽东的建构更为真实、鲜活，毛泽东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精神生活的信条，解构并重塑着人们的情感结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民间歌谣这一通俗化的大众文艺服务于革命斗争。在意识形态的介入之后，“旧瓶装新酒”的民间歌谣实现了从“民间”向“政治”的蜕变，发挥了动员群众投身革命的积极作用，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重要的声音景观。

（三）唤醒民族意识，形塑民族共同理想

“民族觉醒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选择前进道路的新定向、改变前途命运的新追求、焕发生命活力的新跃升，是一个民族达到自觉、立志发奋的思想启蒙和精神发动。”^[24]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需要唤醒民族意识。五四运动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洞察力,认识到了民族意识觉醒在实现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在总结基本矛盾和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民族意识”理论中国化,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的科学概念。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精神层面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意识。他进一步指出,近代殖民侵略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10]455}。这表明,只有唤起中华民族广大民众的觉悟,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凝聚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如何唤醒广大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毛泽东提出,革命文艺必须采取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534},才能实现这一目的。

在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之后,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这就是民族共同理想。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民族共同理想是一定时期社会存在的反映。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其就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同时又将其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具化为不同时期的不同奋斗目标,并带领人民去实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毒害、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争取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民族独立的民族共同理想。广大人民群众对共同理想的认同表现在歌谣中就是对毛泽东形象及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如《毛主席活在咱心头》《北斗星》《跟着毛主席前进》《给毛主席请个安》《人民的大救星》等歌曲,被大家广泛传唱。再如,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唱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这些歌谣将党的革命理想、革命主张浸润其中,唤醒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意识,凝练和形塑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此同时,这种以民间歌谣为基础的“全民性”的民族形式,

促使了民间歌谣的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与时代化,使其实现了与“旧传统”的融合^[2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间歌谣这一艺术样式对毛泽东形象进行传播,推动了革命精神的传播与弘扬。其成功的原因,不仅在于民间歌谣本身所特有的文化属性,还在于“官方”与“民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张力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借助民间歌谣建构了毛泽东的形象;另一方面,民间歌谣主动参与社会变革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塑造了毛泽东形象。实践证明,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在普通民众之间传播,不仅加深了群众对党的革命主张的认同,而且推动了革命浪潮滚滚向前。

参考文献:

- [1] 刘亚律.听觉美学:一种美学建构的可能[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1):159.
- [2] 赵湘学.视觉文化中的毛泽东形象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4(4):9.
- [3] 赵宏.试论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音乐形象特征[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4(2):33.
- [4] 王大桥,刘灿.听觉政治及其表达机制[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9,22(1):139.
- [5] 王丹.革命歌谣: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话语[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11):66.
- [6] 唐小兵.聆听延安:一段听觉经验的启示[J].现代中文学刊,2017,46(1):4.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郑紫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央苏区戏剧中的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9.
- [9] 罗伯特·A·达尔,布鲁斯·斯泰恩布里克纳.现代政治分析[M].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
-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佚名.拥护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N].群力报(胶东),1945-07-1(1).
- [13] 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76.
- [14]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43.
- [1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3: 467.
- [16] 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 [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1-04-20(1).
- [17] 习近平.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N]. 光明日报, 2022-10-28(1).
- [18] 胡国胜. 政治符号: 概念、特征与功能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0(2): 74.
- [19] 柯弄璋. 当代红色经典中的风景书写与政治认同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3): 116.
- [20] 揭祯琳. 毛泽东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兼评石川祯浩《“红星”: 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23, 40(3): 68.
- [21] 陈培永.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基本问题: 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思考 [J]. 浙江社会科学, 2021, 298(6): 16.
- [22] 李仁卿, 刘岩岩. 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认同功能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3): 6.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3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243.
- [24] 颜晓峰. 民族觉醒和团结激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 [N]. 光明日报, 2014-07-09(1).
- [25] 徐明君, 顾梓莹.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5(1): 86.

责任编辑: 黄声波



(上接第60页)

- [4] 耿化祺, 邵战林, 魏慧芬. 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一号线沿线房价影响研究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2019, 41(2): 223-228.
- [5] 冯友建, 陈天一. 基于SEM模型的轨道交通对住宅价格的空间效应: 以杭州市为例 [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20, 47(1): 115-122.
- [6] 董志勇, 官皓, 明艳. 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0(2): 98-103.
- [7] 牛阮霞, 何砚. 基于特征价格模型的共享住宿平台房源价格影响因素研究 [J]. 企业经济, 2020, 39(7): 27-36.
- [8] 包燕萍. 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基于重庆市轻轨3号线的实证分析 [J]. 交通企业管理, 2014, 29(6): 42-44.
- [9] 徐宗祥. 城市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对当年投资乘数的影响研究: 以湖南数据为例 [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5(5): 69-74.
- [10] 桂再援.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化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 以杭州市为例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21.
- [11] 武倩楠, 叶霞飞. 城市轨道交通可达性提高和住宅价格增值关系 [J].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44(6): 899-906.
- [12] 王波, 曹吉鸣. 轨道交通开通对住宅价格的影响 [J]. 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 2017, 34(3): 81-85.
- [13] 唐文彬, 张飞涟, 颜红艳, 等. 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值影响的空间效应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6(6): 96-100.
- [14] 彭志胜, 刘妃平, 张帅. 我国人口流动对房地产经济的影响研究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2): 1-7.
- [15] 孙伟增, 郑思齐. 轨道交通的经济学: 土地利用、城市活力与环境质量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 37.

责任编辑: 徐海燕